

# 躁动的莫言热与渐远的书香

□董建国

又到诺奖季。转眼间,诺奖颁给莫言已是须臾一年。一年里,莫言很忙,各种“莫言热”仍在延续。

一年里,继家里的萝卜被拔光、“莫言醉”酒注册后,接下来整个“东北乡”大幅引入文化投资,除了在高密拍摄《红高粱》电视剧外,当地还计划以莫言故居为中心,打造乡村文化旅游基地,种植万亩红高粱。而今年国庆节,媒体报道说,莫言旧居附近的沙口子村公路两侧,参观的车辆排了足足两公里长。

不过,躁动的莫言热的另一面却是,他的一些书籍已逐渐退出畅销书排行榜,已非昔日洛阳

纸贵。原来,游客们乐此不倦无非是想沾点莫言家萝卜和红高粱的“喜庆”,借以图个吉利,而当地政府的“干劲十足”显然也与莫言的文学关系不大。

对于素有诺奖情结的国人来说,莫言得奖治愈了中国文学“百年诺奖焦虑”,让中国文学腰杆直了很多,隆誉盛名实属应当。按理说,对“文豪”的尊重应该是用心地研读其作品,多一些对文学本身的专注和热情,而非一味拔萝卜、赏高粱。

我们以为莫言的获奖,兴许能带动文学热,提升全民阅读的氛围。事实证明,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。相关调查数据显示,2012年我国18—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.9%,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.39本。与周边国家相比,显然仍有差距。

莫言的获奖曾是文学的骄傲,现在却变成了商业的凯旋。起哄的人们将莫言视为实用商品,按照其品牌价值论斤论两各取所需。众声喧哗中,莫言正被强行拉进偶像的流水线,被加工,被想入非非。这是文化消费时代的吊诡记录。在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中,任何严肃的事情都不被严肃地对待。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,如果做不到,就索性把解构严肃本身当做一种娱乐。只是,当人们把莫言过度消费和解构后,我们离文学和阅读却可能更远。

今年诺奖季来临,我们关于文学的遐想又来了。当然,作家如故,文学如故,一个诺奖带来的亢奋总要淡去。如何找回我们爱书的传统却是一个长久话题。

## 百姓说话

### 家有老人是福

□戴忠群

家中有老人特别温馨,老人为家庭遮风挡雨,付出了很多很多,老了也不忘关心下一代的生长。老人们经历坎坷,久经风霜,走过人间的风风雨雨,酸甜苦辣到了今天,阅历要比年轻人丰富得多,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。老人们把优秀的传统美德传给孩子们,孩子们也会从老人那里领悟到做人的真谛,这是千金难买的朴素情怀。

老人是年轻人坚强的后盾。现代社会是竞争激烈的时代,年轻人为了事业,必须拼命工作,上班了,工作忙,就把孙子、孙女让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们给带着,既放心,又贴心,又顺心。如果没有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们的精心照顾,年轻人哪会有心去努力工作!想一想,这是多么幸福的事。老人是年轻人贴心的好后勤。现在是快节奏的信息时代,年轻人上了一天班,干了一天活,很累,不少上班族还不会做饭,下班后只好随便找个地,吃顿饭应付一

下,时间长了,吃饭也不觉得香,还不能和妻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。如果家中有老人在,情况大不一样,老人们白天上街买个新鲜蔬菜、活鱼活虾,到家里把饭精心做好,当你下班回家,与妻儿老小一起吃上一顿香喷喷、热乎乎,可口的饭菜,胜过酒店的美食佳肴,这也是人生的美事一桩。

你再看看有些年轻人的家里,由于工作忙,还要送孩子上幼儿园、上学,哪有时间去收拾房间,早上急匆匆地离开家,屋里凌乱不堪,这时如果让客人进家,都不好意思。如果有老人在家,立马大变样,勤劳朴实的老人们为了孩子会把房间整理得干净整洁、有条不紊。当你下班走进房间,往沙发上一坐,那井然有序的环境,让你心旷神怡,一天倦劳烟消云散,这就是老人们用朴素品格创设的美好空间。

家中有老人是幸福的,作为晚辈要百倍珍惜,对父母要更加孝顺,让老人们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生活在家里面,和儿孙们共享和谐社会带来的幸福生活。让我们用心去品味,用心去报答,愿天下老人们,平安享春秋。

## 微言大义

### 【高考英语不计入总分】

江苏新高考方案正在酝酿改革,目前最有可能的模式是高考考语文、数学以及文理“小综合”,而英语将实行一年两考,不再计入总分,而是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,高校在录取时将对应英语等级提出要求。(10月9日《扬子晚报》)

**④理性批判:**江苏高考不再将英语计入总分,我觉得是好事一桩。事实上,中国孩子在英语上消耗的时间太多了,英语可以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未来职业规划的需要,来自行学习。就像游泳、书画等一样,学习与否,不应成刚性要求,而应由个人兴趣决定。

**④芒的格:**支持要学好英文,但坚决反对应试化体系和过度的英语热。只是,少了英文课,高考仍然完全是分数制,其他课的竞争更激烈了。高考要改革,就不能只在削减英语分量的“皮毛”上下功夫。

### 【其他】

**④丰华:**据报道,10月9日消

息,四川青神县为全县年满60岁的老人赠送手机,并提供最优惠的通信资费 and 售后服务。看似是善举,不过,我比较关心的是,由哪个运营商提供服务,套餐详情是怎样的。让老人也能用上通讯工具,是好事,但不能拒不告知话费、月租等。

**④余世存(作家):**作家张宇光先生在乡村做了大量调查后说,我们的开发热跟历史上“改土归流”一类的运动相类似,都是对资源的超经济控制和盘剥。找到当代社会跟历史的结构联系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,唯有作此揭示,我们才知道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充当的角色,历史也才有真正的进步契机。

**④牟波沁:**今天媒体报道,广东茂名一六旬精神病患在住院期间双眼被挖。“挖眼”词眼委实很具眼球冲击力,因为太残忍了。在该案中,不能搞“有罪推定”,精神病患志不清,挖出自己双眼,不是不可能。要判断是自残还是他人伤害,检查创口、仔细甄别,或许不难得出结论。

## 点点评

**新闻:**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,故宫出版社已经申请到国家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书画类的资格,建立面向全国书画学习者的技能培训与测评系统,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也将像英语、弹钢琴一样设置不同的级别,有关考级的相关培训也有望在未来成立的“故宫学院”举办。(《京华时报》10月10日)

点点评:宫里出来的……

**新闻:**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、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,国务院明确提出各地应通过户籍、纳税或社会保险缴纳等手段,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。然而,在与北京交界的河北部分县区,这里的楼盘通过向购房者出售、提供社保证明等方式,大张旗鼓销售商品房,国家相关政策在这里变成了一纸空文。据悉,做一套社保证明需要7000块,做假证明在当地已成产业链。(CCTV10月9日)

点点评:环北京造假带。

**新闻:**六年前,主持人当着原广州市人社局局长面拨打12333热线,结果打不通;六年后,主持人再次当着新局长的面拨打,还是打不通……这是发生在广州某电视节目录制现场的一幕。对此,广州市人社局现任局长杨秦诉苦称,主要是缺人缺钱,“如果给我人给我钱,我马上整改,再搞不好,我愿意做检讨”。(《新快报》10月10日)

点点评:“凉线”。

**新闻:**去餐馆吃饭,有奖发票刮出中奖金额“拾万元整”。昨日,宜宾高县周女士满心欢喜带着发票去兑奖,却被高县税务部门告知:只能兑10元。原来,发票背面注明了最高兑奖金额只有3000元,而通过票务系统查询,这张发票的中奖金额也只有10元钱。发票印制单位称是在喷涂奖区涂层时出现的掉节现象,“拾万元”其实是“拾元”。(《华西都市报》10月10日)

点点评:中奖梦。

## 画里有话

培养好公民!



### 砸毁手机

□何勇海

网友称河南浚池高中校领导当着全体师生及家长的面,集中砸毁数十台学生的手机。学生表示确有此事,以前也砸过。校方称:本次考试总计收缴手机34部,销毁手机是为严肃考纪,“引导学生诚实守信,为社会培养守法守纪的合格公民。”(《大河报》10月9日)

学校集中砸毁学生手机的做法,过于偏激,可以说是一种“教育暴力”。根据《物权法》相

关规定,手机是学生或家长花钱购买的私人物品,是合法财产,也就是说,使用手机是公民的合法权利,学校无权擅自砸毁。校方将学生好端端的手机砸得稀烂,已涉嫌构成损坏公私物罪,理应照价赔偿。

从学生权益角度看,对学生手机一砸了之,用强力让学生屈服,是对学生权利的极大漠视,有可能起不到任何震慑效果,反而产生“逆向激励”:你越是要砸,我越是要带手机进校园。不是已有很多学生表示“反感”、“不能接受”吗?

从学校角度看,学校不能用违法的方式教育学生。即使

学生玩手机违反了校规,甚至参与作弊,教育工作者只能教育批评,不能偏离为人师表的行为准则。比如对没收上来的手机,学校可直接交还家长手中,或代为学生保管,直到其认错并悔改后归还。而大张旗鼓地集中砸毁学生手机,则侵犯了学生的私人财产权。用违法侵权的方式教育学生,何谈培养守法守纪的合格公民?

如何更加智慧、温情地教育与管理学生,既尊重学生个性,又让教育教学有序推进,既尊重学生的合理化诉求,又能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,是当今中小学管理者最应该考虑的。

## 今日观察

# 摊派精神病指标像是“没病找病”

□余宗明

去年9月,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,规定各辖区筛查重性精神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总数的2%。该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辖区医院的考评中,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督导和扣分。为此,有些社区通过义诊或、突击筛查,来征集线索。(《南方都市报》10月9日)

筛查精神病,竟搞“指标摊派”,委实令人大跌眼镜。据了解,该筛查行动,并非临时起意,而是“686”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的一部分。它意在编织覆盖面广的治疗管理体系,强化对精神疾病的防控救治。

着眼于治理末梢的基层,多方联动,主动排查、救济精神病

患,而非任其自流,颇具善意;可筛查之时,还层层下发指标,并据此考核,却陷入了“量化窠臼”,太过僵化,也缺乏科学性。

可问题是,精神病发病率,统计依据是全国范围内的普查,而精神病并非“均匀分布”,存在区域差异。不同社区的重性精神病患占比不一样,一刀切式地立指标,未免有失偏颇。可以想见,在硬性指标的压力下,某些社区难免会被“卡死”,不得不“凑人数”,这或助长“被发病”“被重症”的乱象。

对精神病患“逢病必治”,固然重要,但它不该成“没病找病”,而应是在缜密排查的基础上,发现一例治一例。若社区的重性精神病发病率超过2%,那就算完成了“指标”,也未必没遗漏;而有的社区,确实一个重症精神病患都没,总不能让其做“无米之炊”,“变戏法”变出几个

来。

督促社区定期随访或逐户排查,挺好,可迷信“指标”,却忽略了社区的“地情差异”,易让筛查变得教条化、形式化。更何况,对精神病患而言,量化指标下的治疗,未必就奏效。他们更需要的,是针对具体病情的公共服务供给,是对的救助治疗。

精神病指标摊派,委实不合理,它指向的,是“泛指标化”的误区。在当下,“泛指标化”已蔚然成风,从善款募捐到行政收费等,指标摊派现象很严重。为理清政府与社区的职责权限,河北省民政厅还曾规定,基层政府不得向社区硬性摊派任务。

说到底,精神病患筛查,要的是“无遗漏防治”,而非人数“多多益善”。“有病推定”下的指标摊派,抖落了“泛指标化”之弊,也难免激起一摊口水。